

第十章 京城琐记

我离任后，1922年8月，资深望重的政治家唐绍仪受命组阁。唐先生时在广州，事前甚至没有人去征求他的意见。而其阁员派系复杂，包括北洋军人及其盟友、议长的一位亲信和王宠惠与顾维钧两博士。诚如预期的那样，内阁仅不足一月，就不得不改组，由王宠惠博士接任总理。改组后的主要阁员，大都是接近或被认为是靠拢吴佩孚将军的人，其中包括新任财政总长罗文干博士。

由于拥有政治野心的国会议员未能参加新内阁，政府总理亦非国会推荐，因而内阁总长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时，不仅遭到恶语攻击，乃至拳脚相加，逼得报告人夺路而逃。因而使原本就存在的政府与议院之间的冲突发展到极点。最糟糕的事情远非如此，议长还秘密呈报大总统，指控财政总长在签订奥国借款延期协议时，接受贿赂。在内阁获悉有关情况之前，罗文干总长本人已身陷囹圄。在政府议院联席会议上，内阁指责总统羁押总长不符合宪法程序，要求按司法程序移送法院审理。在双方争执未做出任何决议之前，一批议员涌入总统府，阻止大总统颁布有关这一事件的任何命令，而议会方面却正式通过弹劾内阁王总理和外交顾总长案。尽管内阁已递交辞呈，毕竟迟至11月29日才获准，或许是拖延才留下了猛烈政争的历史纪录。

随后，政界元老汪大燮先生又受命组建临时内阁，参议员工正廷博士的名字首次出现在阁员名单中，出任外交总长。不久，张绍

曾将军正式组阁,并获国会批准。施肇基博士任外交总长,王正廷任司法总长,其余人选由直系干将、国会议员和大总统的几个亲信组成。只是施博士的任命因政治平衡被国会否决,故其任期还不足一个星期。

1922年12月,张绍曾内阁成立。他自当年8月起曾两次出任短命内阁的陆军总长。张先生本为北洋旧人,攀附直系较晚,早年已声名狼藉。1911年,他任北洋第二十镇统制,10月,武昌起义爆发,率军由奉天开赴前线,行至关内滦州,通电北京,请清廷立即颁布宪法,以平熄革命之火。其后许多年,他无声无息。自从与吴佩孚将军结为姻亲以后,1922年起,重返政界,扮演政要角色。他的内阁容直系干将和黎大总统的密友于一起,标榜“和平统一”的政略,然而,这一主张不过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已,北洋武人亦讥之为空想。他们之所以认为“和平统一”是没有希望的,就在于此时,孙中山先生已从上海回到广州,重建了“大元帅府”并组成简单的内阁。

直系军人在黎大总统复职之初,答应他的裁军主张,是为了促其复位以资号召,而对张总理的主张则丝毫不感兴趣。为时不久,事情愈来愈明显,军阀力促黎大总统重返政治舞台,是存心利用他作为过渡,最终推曹锟登上大总统之位,而张总理组阁,不过是作为达到上述目标的利用工具而已。为了迫使大总统辞职,不久以后,就为他准备了一个不合作的内阁,接着指使京城军警罢岗求饷,组织所谓公民团请愿游行,吁请选出一位新总统,乃至切断大总统官邸的水电,迫害方式无所不用其极。事情闹到如此卑鄙下流的地步,皆是出自总理的“支持者”的授意。1923年6月13日,黎大总统离京赴天津,其后,国会迫使议员通过议案,自13日起,

大总统所发布命令一概终止执行。虽然黎大总统迫于压力出走，依例应由内阁暂摄国政，但是，一些其他派系的国会议员则反对这样的不光彩决议。更有议员追随废黜总统去了天津，公开谴责他们同事的决议。

这一年的6月至10月，直系诸要员忙于将忙于筹备通过国会选举新总统，或者说是让国会接受认可已定的下届总统，更为确切。直系军阀一方面以重金贿赂议员，据报导，每票开价由5000至10000元不等；另一方面，以武力胁迫议员。双管齐下以后，遂于1923年10月5日，国会开选，出席议员550人^①中有480人将选票投向了曹大帅，曹锟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三任大总统^②。10月10日，大总统就职，颁布宪法141条，这部宪法系国会应景仓卒续成。原内阁继续留任，长达数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内阁摄政期间的最后一次行政竟然是发布选举新总统之令。

1924年1月，正式内阁成立，曹大总统任命我的妻兄孙宝琦先生为国务总理。孙宝琦邀我出任农商总长，而顾维钧则留任外交总长。新任财政总长（王克敏）极具实际能力，每月可以毫不费力地筹集350万元经费，保证军政开支。不过，如此大的财政收入，也仅能供政府勉强维持，只有待关税会议议决成功，税收增长，方可谈及人们热望的国家重建的任何计划。

我在农商总长任上，尽力而为，希图有所改进，例如裁减冗员，为赢得外商对中国产品的信任，改组了商标局，并召开工商会议，讨论有关中国建设的问题等。

① 一说出席者有590人。——译者

② 所谓第三任，系指通过了正式选举，而非以副总统补位大总统。黎、冯系由副转正。——译者

令我惊愕不已的是，部中有 30 余位农业专家，他们都毕业于日本、欧美的农学院，现在却整日围坐部中，无所事事，只是以例行公事消磨时光。在一次会议以后，我建议他们把专长用于实际，在部属的各实验场开展技术工作。翁文灏博士领导的地质调查所，在瑞典人安特生博士(Dr. Anderson)和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博士(Dr. Grabau)的有价值的协助下，取得了科学研究上的重要成果，而另一位部聘外国专家则因其在京饱食终日，无所作为，故我部对其予以解聘以节省每年的巨额薪金。该人也愉快地返回了故乡。

当时，中苏两国之间正在进行谈判，苏联代表加拉罕先生尤为关心中苏关系正常化和中东铁路问题。1920 年，叶恭绰先生任交通总长，曾与华俄道胜银行(The Russo-Asiatic Bank)签约，解除 1896 年清廷与该行签订的有关中东路的政治性条款，俄方首次接受中国人出任中东路管理的重要职务，同时参加董事会。这一解除协议被看成仅是临时的。因为道胜银行从一开始就是帝俄政府的鹰犬，因此，事实上完全是帝俄财政支持修建的中东路。

中方代表王正廷博士与加拉罕先生的谈判历经了数月，而时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博士对谈判的进展情况竟毫不知情。后来在一次内阁会议上，王代表多少有些故意，向大家披露了他与苏方代表草签的中苏新约。顾外长对此极为愤怒，坚持在内阁审议前，新约必须先移交外交部详细研究。如此，不仅陷王代表于窘境，而且造成阁员及大总统对他的不良印象。于是，决定结束王代表的工作，改由外交部全权负责。加拉罕先生当然也十分不快，对这样的变化，他曾一度坚持原签草案，拒绝更改，最终还是迫于压力，接受了改动。一部全新条约，经他与顾博士签字正式生效。

从以上各章中,读者想必已注意到财政总长在每届内阁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以及和总理之间的私人情谊。总理若不控制财政总长或失去他的支持,就无法继续任职,不得不终止工作。现任财政总长出自大总统的特选,对总理既不友善,又不忠诚,甚至在国务院每月约五万元经费中做手脚,不是借口财政困难,请求减拨,就是多方克扣。国务院不像其他部门,没有自己的收入,总理处于如此举步维艰的境地,无法行政,因此,与财政总长之间关系迅速破裂。最终,由于总统府偏爱财政总长,所以,虽然总理口碑甚佳,其个性与声望不仅可见于社会与政界的报导,而且,由于他的诚挚和斡旋,使国会趋于团结,但此时,孙宝琦先生感到惟有辞职方可解脱。随着孙总理离去,顾博士以首席阁员代理总理一职。

下一任总理再次落到我的肩上。1924年8月,我受命组阁,虽深知困难重重,危局即将降临,奉军及其盟友一直对曹锟大总统耿耿于怀,但是为了服务国家,寻求和平安宁,不便立即拒绝。内阁顺利地经过国会的批准,我以总理兼内务总长,其余各部总长几乎全是旧任。

然而,内战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任总理的第二月,上海附近燃起了战火,奉系盟友、浙江督军卢永祥在江苏督军齐燮元与福建督军孙传芳的夹击下惨败。齐、孙二人隶属直系。

紧接着仍是例行的两派系通电相互指责漫骂,历数对方罪状。随即奉军发兵分五路进关。大总统派兵分三路迎敌。其中一路,即是由世称“基督将军”的冯玉祥负责指挥,这支部队步行开赴热河。吴佩孚大帅时任陆军总长,又被任命为总司令,他从河南洛阳赶到北京,与我和数位阁员相见。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席内阁会议,我特请他和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分别发表对内战前景

的看法。吴大帅异常坚决地表示,奉系军阀反叛、对抗中央政府,应予消灭,似乎他对战胜奉军并不感到有什么困难。当时我与另一阁员提醒他,内战极可能招致外国的干预和生灵涂炭的悲剧。最后征询他对军费的需求时,就此他开出每日30万元的数目,并问财政总长如何筹措到这项必需的经费,财政总长回答说:“尽力而为。”

在总统府召开的重要会议上,出席者有曹大总统、吴大帅、总统府秘书长、直隶督军、陆军总长、交通总长和我。我再次对在座各位表明,如果战火引向关外,确有可能引来日本方面的干预,彻底消灭奉军是极其困难的,奉军倘有不利,必向东北撤退。令我惊异的是大总统与吴大帅态度如出一辙,声称必须坚决消灭他的盟弟、东北王张作霖。并宣告,如有必要,将把奉军赶至哈尔滨。而国会一扫平日令人生厌的吵嚷与惯用的否决方式,面对即将来临的两大军阀之间的战争灾难,变得像坟墓一样沉寂。他们清楚,开罪两系的任何一方,都将带给他们身家性命的危险。

会战的主战场放在了京奉铁路沿线,吴的心腹彭寿莘将军率领的政府军扼守山海关一线,直接听命于总部,吴大帅本人对此路军事行动特别关注,密切注视其形势变化。第二和第三路大军由热河推进,侧翼迂回打击敌人。但是,因他们不得不长途徒步行军,只能在数周后才可对敌军产生压力,所以,其重要战报送达北京也比较迟缓。冯玉祥为第三路大军司令,最后离京开赴前线。

显而易见,无论第二还是第三路大军都对讨伐奉军都不太热心,只有曹大总统和吴大帅对扫平强敌满怀必胜信心。事实上,高级将领长期生活于繁华都市,久沐奢华,已不能尽战守职责。此外,在京畿靠近财政部及税务局,能够随时为他们自己和所率之军

索要军费,如此利益的诱惑,使他们都不愿出军远征,然而吴大帅决心已定,出于各方面考虑,调各军离开北京。

战争始于9月初,在南线首先打响,两周后北线也展开,双方互相指责,一如平时一样。在普遍感到局势严重的情况下,内阁几乎每日午后都召集阁员听取战报,梳理政局发展的脉络。

内阁教育总长黄郛先生是冯玉祥将军的密友,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民国成立以前,就已加入革命党。1911年,他参加过攻打上海制造局之役。1922年,我们初次会面,他那时刚从欧美考察归国,此行费用系徐世昌大总统提供的。据说徐大总统出版的有关欧战后的经济与教育一书就是由他捉刀的。华盛顿会议以前,徐大总统提名,我特聘其为我国代表团的顾问,因此,他一回到北京,就轻易地进入政治圈内。他还同中国银行与北京大学的官员们过从甚密,并充任北大讲师之职。上述简短的介绍有助于说明他出任内阁总长的原因,尽管他早年也是一位毫不妥协的革命之士。他经常不出席内阁会议,但未引起注意,直到晚些时候,人们才恍然大悟。

9月23日,早7时,门房惊慌地将我叫醒,报称:街上布满士兵,据悉为冯玉祥将军的部队,他曾给警察局打电话,但是电话线已被切断,他深感事态极为严重,故前来通报。我以最快速度起床,试着与警察局、卫戍司令部、及内阁同人分别联系。同时遣仆人出门打探消息。仆人从附近探询以后,回来报告,冯玉祥将军回师北京,发表和平宣言,并包围了总统府,请求大总统同意他们的政见。此时,毋庸置疑,“基督将军”已然发动了他一生中第一次重大的政变。这一判断迅速被证实,一位内阁同僚数小时后前来拜访,并希望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9 时左右,一位参谋率四名荷枪实弹的士兵乘敞篷汽车,来到我家,递上孙岳将军的名帖(我知道他是冯将军的部属,但同时又是曹大总统的义子),代表其长官请我前往附近的一座庙内与其相见,说有要事相商。我坦然前去,进入孙将军会客室时,见他正与总统府秘书长对卧烟榻,吸食大烟,叙旧言欢。我的忧虑顷刻全消,感到北京的一切问题,似乎都可和平解决。孙将军彬彬有礼,解释了冯将军回师北京的理由(事实上,听说冯从未离开过地处北京城的北苑军营),称冯将军此举是为了国家利益,阻止不必要的流血战争,等等。

稍后,他代表冯将军提出严厉要求:必须对吴佩孚大帅撤职查办。我感到不妥,表示依个人所见,至少应给吴大帅一闲职维持体面,以免其受辱。最后,我告诉孙将军,已记下他所有的要求,但必须立即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后,报请大总统批准,方可实行。好在总统府秘书长在座,立刻报告大总统似无问题。

我告辞后返回家中,发现除黄郛先生外,全体阁员已在客厅等候,于是我当即召开紧急内阁会议,讨论冯将军提出的要求,直系阁员听说其突然倒戈,甚为震惊,平日与之相交甚笃的其他阁员也不免惊愕不已。显然,政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降临,完全出乎意外。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大队人马从热河返回,内阁竟然没有得到卫戍司令的任何通报,冯军就已开进北京城。事后,卫戍司令自称,他事前也全然不知,只是当日早晨起床后,在他家附近的墙上看到冯军士兵张贴的告示,才得知事变。他的情报系统就是这样的无能!

内阁别无选择,只有接受冯将军的全部要求。当天早晨,没人见过大总统,也不知他的反应,冯军已把总统府团团围住,更无法

向他通报。

内阁会议尚在进行,突然闯进六、七名冯军将校,催逼我们立即颁布命令,声称士兵长途跋涉三天三夜,已疲惫不堪,情绪甚坏,因而,任何的拖延不决,都将给大局带来更为不幸的灾难,枪炮已陈于公府门前,他们只能保证所控军队在下午两时以前不闹事,过此期限,他们不再认为部队还能保持北京的平静与秩序。

听到这几位将校的威胁之辞,我顿感不能俯首听命,就是这几个人,仅在数周前,我还应邀与他们相见谈话,共进午餐。因此,我态度坚定地告诉他们,内阁将全力寻求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而非下最后通牒就能解决问题,内阁颁布政令有自己的一套程序,从拟稿到形成公报发表,需费时日,其中还包括大总统签字用印和内阁副署,决非一蹴而就。我讲这些话就是要使他们清楚,眼前的暴力要挟和任何骚乱他们都将负有责任。随后他们离去。

大总统已被拘禁在总统府,依靠总统府秘书长报告时局情况,至此只得被迫接受惩办吴佩孚决议,同意用印发表,只是深悔错信了人,方陷如此困境。

随后依照内阁责任立场,我与全体阁员总辞职,在给大总统的辞呈中称:其一,我们有负重任,使之坐陷拘禁;其二,无法再像往日那样为国服务;其三,处此国事混乱之局,我们不可能再掌政府行政,故须引退。新内阁当然要根据冯将军的意志重组,他现在是北京的主人。令我惊异的是,很快我就接到他派来的高级副官带来的口信,让我继续担任总理,但同时,阁中直系人物不得留任。我断然拒绝考虑如此的方案,而建议由事前知情,实际参与策划政变的教育总长兼任总理,这样,在局势发展中,更有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

冯将军对于我的拒绝,十分不快,却接受了我的建议。事后听说他抱怨我在关键时刻不予合作,因为他认为事先已将反对战争的主张与计划全部告知于我,所以,对我的拒绝,十分不满。我搜寻记忆,想起时任内务次长(我兼任总长)的他的一位亲信,在政变前几日确曾向我提及冯将军反对内战,盼望寻求和平的意愿。我当时表示,我也像冯将军一样反对内战,但两军既已列阵于山海关,身陷其中的任何人已没时间奢谈突降的和平,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随之降临的灾难。冯将军的这位朋友见话不投机,便没有再深谈。他极可能没有将我的看法回报冯将军。

黄郛将军可能出于谨慎的缘故,先是拒绝,而最后还是接受了代理总理之职,所有直系阁员均被替换,由王正廷博士和其两位好友分别兼任所空之缺。内阁重组没有引入几位新人。这一临时内阁极其短命,因为冯将军与他的新伙伴张作霖大帅已联合段大帅。不久段大帅自天津家中,抵达北京,组建了全新的政体,不再玩弄“法统”或“护宪”的把戏。段到北京之前,曹锟大总统已通电,于1924年11月3日下野,故总统空位期由黄郛内阁摄政。

这里先暂按下国事不表,让我谈谈这一时期成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我曾参与该会的创建并连任数载董事会主席。或许人们还记得,中国用美国第一期庚子退款建立了清华学校,我任外交总长时,该校又改建成大学,由我表亲曹云祥先生担任校长。多年以来,我国还利用此款向美国派送不少留学生。

1920年前后,美国又发现另一笔中国赔付的庚款剩余,遂拟定用作第二期退款。此事在施肇基博士主持下,由我国驻华盛顿使馆负责与美方接洽。美国国务院退款议案必须经过该国国会同意始可执行。施公使与许多美国国会议员关系不错,他们均表示愿

意帮助国会通过国务院的提案。在中国的美国朋友也运用他们的影响,促成国会通过退款议案,其中,韦棣华女士(Mary Elizabeth Woods)尤为热心,她是美国传教士,执教于武昌文华书院。她特地赶回华盛顿,留居数月,四处奔走,游说国会通过退款议案。她深爱图书馆事业,在文华书院为培养图书馆管理人员,创办了一所学校。除了倾力帮助这所学校之外,她还希望见到中国各地都能按照卡内基(Carnegie)思想建起图书馆,开发民智。最终,美国国会顺利地通过了第二期退款议案。

中国政府随之于1924年9月17日发布接收命令,当时我任国务总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就此组建起来,作为接收、保管、使用美国退款的合法信用机构。该基金会的董事会有15人,中方10人,美方5人,皆由两国政府会商推出。首届入围的中方董事有施肇基、顾维钧两博士、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校长周诒春、著名科学家、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胡适教授和教育总长范源濂先生等人,美方董事有孟禄博士(Paul Monroe)、杜威博士(John Dewey)、北京协和医院董事顾临先生(Roger Green)、美国花旗银行经理白纳脱先生(Charles R. Bennett)和中国交通部顾问贝克博士(John Earle Baker)。首席主管范源濂先生花费数月起草董事会章程、细则及基金管理办法。这类组织实属首次出现在中国,确无先例。为此董事会又声明:

受命保管美国所退庚款之中国基金会保证:全款皆用于促进教育,致力科学发展、文化进步。为改善中国现状的一切学科发展均应资助,诸如:科学研究、实验探索、科学教育之训练等,推动永久性的文化事业,如图书馆等业。

这一原则经过多人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共同磋商,又经中美两国认可满意,始成决议。其中特别提出“图书馆”,一是满足美国立法人的兴趣所在,二是报答韦棣华女士的努力。她非常愿意在中国建起更多的图书馆。

决议既已做出,基金会即准备接收美国政府所退的庚款,以便按照美国国会通过的联合议案所示的意图开展工作,根据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公开的听证报告,此退款总额共 12545438.67 美元,其中本金 6137552.90 美元,利息 6407885.77 美元。自 1920 年 12 月 1 日起至 1925 年 7 月 10 日退款结止,美国累积还应付 1377255.02 美元。基金会原计划取退款的半数,也就是 600 万美元作为不动的基本基金,然而不幸的是,计划终未实现,因为资助拨付之款每年都超出预期。到 1940 年 12 月 31 日,基金会存款共计“国币”5880568.24 元,(1264303.24 美元和 16126 英镑 16 先令 3 便士)。

首次董事会议重要的决定就是在北京建立一座大型图书馆,以便收藏外文的科学鸿篇巨著。按照中国宫殿风格建起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雄伟壮观,已成为北京的骄傲。馆中收集了大量的科学书籍,此外,还备有不少期刊。馆长袁同礼先生通过与世界各大图书馆交换书刊的方法,使馆藏日益丰富。该馆竟能在中日战争期间安然无恙,但愿这一中美友好合作的文化见证得以永存。

董事会通常每年举行两次会议,只因近来战争的原因改为一年一次。该会同时也是清华大学基金董事会,清华大学基金总量约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的两倍。除此之外,还有数种名目不同的小额基金,统归该会掌握,所以,该会财政委员会及其财会人员因职责所在,异常繁忙。

1941年至1942年之间,向基金董事会申请资助的教育与文化机构共23个,当年分拨每一申请机构“国币”5000至15万元。总支出“国币”80万元,美金16000元。此外,国立北平图书馆和范氏生物研究所由基金董事会和两个相关协作委员会共同担负经费。另有6项教授科研费、25项研究员经费、14项研究补贴和董事会直属的编译委员会的经费,也由基金会直接议定和拨付。

在接受基金会资助的机构中,还有设在纽约的美国中国学会(The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该会自己也有一个委员会。该学会的重要职责就是传递美方的消息,帮助中国学生进入美国大学学习,为他们寻求进入政府或私人企业实习,以及参与公众事业的机会。同时,也负责向美国介绍中国文化。该会发行定期刊物,回顾评论中国历史与现状,以中国为主题出版书籍文章。虽然其组织规模与日常经费都在一般水平,但该会在美国文化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得到中美两国人民的高度赞赏。

依据基金会章程,中国政府在指定首届董事会之后,不应再染指董事会事务,而是放手让董事会自行改选董事。但国民政府成立后,全然不顾这一原则精神,常常对董事改选横加干涉,甚至塞入国民党政客之流。然而,随着时光流逝,政府逐渐熟悉董事会的性质与工作,也就不再施加自己的影响,由董事会依照原定章程自行决定董事人选。

我在这里绝不是自吹自擂,该基金会的成绩可以证明,其工作既务实公正又井井有条,远胜于其他同类组织的管理。它的年度报告完整精确,财政账目收支均经详细审核,全部公布,已和美国同类的著名基金会的管理方法相去无几。该会为我国的公益事业机构树立起优秀的管理模式。其管理方法完全忠实于章程总则,

规章细则、管理条文一应俱全,资金流动账目必经严格审计,务使诸事项管理符合章程。而这一管理方法正是中国至今仍极其缺乏的。董事会诸位董事殚精竭虑,倾注大量业余时间,为基金会服务。

近年来,由于“国币”贬值,基金“国币”部分,包括清华大学基金在内,已遭重创。未能及时兑成外币,供来日教育事业复兴之用,实在是缺乏远见,令人扼腕痛惜。基金会促进教育事业以及清华大学发展的工作,因此而严重萎缩,我深感愧疚。

再让我们回到国内政局的话题上。在政治极度纷乱,军事冲突不断的局面中,段祺瑞大帅终于实现平生宿愿,其追随者也如愿以偿。在冯玉祥将军、张作霖大帅和卢永祥将军等联手组成新的军阀集团之际,段大帅应邀出山,任临时政府的执政。同时,他也得到南方国民党的政治与道义上的支持。孙中山先生应邀北上,拟与北京新政府共商大计。直系因其战败,吴佩孚将军只能被迫退居政治舞台的后面。

冯玉祥将军不满足于废黜了曹锟大总统,还乘势把仍盘踞在紫禁城内的前清逊帝,一并驱赶出宫。1912年通过的所谓清室优待条件,经修改变成:取消帝号;政府优待经费由每年四百万元减至五十万元(就历年拨付情况而言,第一年付给以后就难以为继);必须放弃一切属于国家的财产(也就是后来成立的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所有艺术品及大量书籍档册)。逊帝夫妇先避难于醇王府,然后移入日本使馆,转而去天津,最终奔往长春,成为伪“满洲国”的执政。中国的政治局势就是如此的复杂,飘忽不定。

段执政组织了新内阁(但未设总理),阁员全是南方人,大部分又为其亲信旧友。他颁布了一部简短的临时执政府制六条,作为

新政体的组织与权限的大纲。他倡议召开两次会议。一为善后会议,讨论中国重建问题;另一为国民大会,审议批准善后会议之决定,同时起草民国的新宪法。善后会议历时 50 天而闭幕。除了良好愿望之外,实际上一事无成。

而另一个会议,即预备起草民国新宪法的国民大会则迄今未见召开。徒放空言、希图进用的政客与粗鄙不堪的武夫似乎都非常热衷于草拟宪法之事以及颁布这一历史性文件的机会。之所以如此,不外想名垂青史而已。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在不到 20 年时间里竟颁行了六、七部宪法。至于颁布的宪法,他们自己或国民是否遵行,则永远是另外一回事!

拟定的两次会议,一次开而未果,另一次则终未举行。舆论认为,两会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究其原因,在于最重要的政党——国民党拒绝参加会议,虽然召开国民大会实际上是中山先生提议的,段执政不过是仅想借重其声威而已。许多冷静的评论家早已指出,段执政精心策划的会议议程,只是为巩固新近获得的个人权力。首先,因其系军阀拥戴而诞生的临时执政,故召开国民大会修宪,可以为新政权提供某种法律依据,赢得民众的支持;第二,拖延国会开幕期,实际上就是延长执政的生命,使本属权宜之计的临时执政的时间变长。

孙中山先生到北京时,已重病在身。最初达成谅解的是联盟几方先进行会商,然后再就新政府的组织、政策和人事等问题采取决定性行动。但是,孙先生由广州出发,绕道日本,延搁数日,段大帅及其同党急不可耐,在孙先生抵京 40 天之前,就已组建政府就职。这一既成事实,使双方本来就存在的裂痕进一步公开化。在一系列政治问题上,双方所持观点相去甚远(其中一例即涉及善后

会议,孙先生主张应邀请某些社会团体参加),谁也无法控制与改变合作异常困难的局面。不仅南北两大领袖之间,即使同为北方的军事结盟的各方也在勾心斗角。只要共同的敌人一天不消灭,杂乱的联合或多或少还可维持,一旦各自的目标已经实现,则必重陷于争权夺利之中,挟一己私利相互发难,都渴望让自己的友好旧部占据肥缺,类似的私欲驱使将导致军阀之间的又一次战争,近年来这类历史丑剧一再上演,屡见不鲜。尽管这些领袖本人可能是出于爱国热忱,或是坚信其政治主张的正确与公正,然而,所有冲突的最终解决,与以往没什么不同,仍离不开战争一途。

中山先生就医北京协和医院,但是,经精心医疗护理,也未能挽留住他的生命。他于1925年3月12日逝世。弥留之际,他签署了由其亲密同志起草的遗嘱,这篇总理遗嘱已成为国民党的“圣经”。临时政府给予这位逝世的爱国者以最高的荣誉。然而,在中央公园^①举行正式悼念仪式时,人们发现,段执政没有亲临。久等之后才见内务总长代表段执政前来致意,据他说,执政因脚肿不能成行。

段政权一成立,就接受了法国有关金法郎案的新条件,中国有句成语叫作饮鸩止渴,用在这件事上再恰当不过。此事一出,立刻在曾举手否决金法郎案的旧议员中,引起轩然大波。段执政公开声明了采取承认行动的理由,声称他过去之所以坚决反对接受法方要求,乃是不能相信前总统曹锟能否出于公心,保证清明廉洁,不使中方受损,而现在他肩负政府重任,决心为国家利益解决这一悬案,这样做可以为关税会议的举行扫清障碍,待会议圆满成功,

① 即今天的北京中山公园。——译者

中国可以一劳永逸地消除财政困难。

不幸的是,几个月后,关税会议虽然召开,结果却是失败的。失败缘于两方面原因,一是临时政府倒台;二是归于事前不明智地向法国要求的让步。这一让步,财政部确实立刻收到法国交来的1000万元的现金。但是根据一般计算,中国却增添了3000万元的债务负担。不过,最新的报告显示,歇业的中法银行的实际资产总值,似乎比原来的估价高出许多,果真如此,中国政府的财政损失将可能有所缩小。

引人瞩目、一再延搁的关税会议终于在1925年10月26日开幕。会议召开前夕,发生几起震惊中外的大事,使形势急剧恶化,对关税会议的成功产生不利影响。5月30日,上海发生惨案,当手无寸铁的学生成群结队游行到南京路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前,为那些因游行反对外国工厂虐待中国工人而遭逮捕的同学请愿时,竟遭巡捕枪击,死伤四、五十名学生。紧接着第二个月,广州发生沙基惨案,当广州民众为声援上海五卅运动游行时,在沙基遭到英法陆海军枪击,死伤200余人。这两起令人发指的暴行,当然激起国人的愤慨。声讨英日的罪行包括其在华工厂的丑恶行径的运动风起云涌,全国乃至香港迅速掀起抵制英货日货运动。中国人民对列强的痛恨达到了顶点。

另一方面,列强借口保护他们的所谓权益,在中国横行霸道,不惜动用强大的武力与警察对付组织良好的学生和工人团体,更激起国民党领导的革命运动进步壮大。诚如另一句中国古训所说的那样,敌国外患,促民同仇敌忾。1925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在中国正在饱受屈辱与苦难时诞生,从此翻开民国历史新的一页。显而易见,在广州的国民政府当然不承认北京政府,认为它不

过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仰列强鼻息鱼肉同胞而已。而国民党人的口号是“铲除不平等条约”。

中国出席关税会议的有外交总长沈瑞麟先生、王宠惠、施肇基、王正廷三博士、蔡廷干将军与本人等 13 人,或为委员,或为会议代表。会场设在旧日西苑的居仁堂,政府提供别克汽车听从中外代表使用。连中国在内,共 13 国代表出席了会议,除签署《九国公约》的国家外,还有西班牙和斯堪的纳维亚三国。10 月 26 日,会议隆重开幕,依程序先由中国政府首脑致辞欢迎,并祝大会成功。沈瑞麟先生被推为会议主席,随后主席致辞,并请王正廷博士就中国提出的关税自主议案向大家做详细说明。

大会通过的议题简单明确,共两项,即关税自主(包括裁撤厘金)和临时附加税。议题尽管简明,但实现目标殊感艰难,中国政府此次提出的方案超出了华盛顿会议上各国决定的方案,而华盛顿议案仅规定中国加征 2.5% 的附加税。因此,王博士极其清晰地说明了为什么借大会召开之际,提交超出原定方案的议案理由。中国代表一致期待,应有专门的时间讨论中国关税自治问题。王博士称:当前的大会恰是一次良机,中国政府希望,现在立刻消除中国与列强之间就关税自治问题存在的障碍,以便促进中国关税的自主;建议与会的各国政府发表正式声明,尊重中国关税自主权,承诺尽快解除现行条约中对中国关税自治的限制;同时,中方将裁撤国内过境税即厘金作为回报。地方当局为其利益所征之税,确实不利于商品流通。为防止声明许诺流于空言,中方保证所有措施最迟不过在 1929 年 1 月 1 日之前全部实现。

列强哪里肯放弃自己的利益,对于协议的商讨与执行,只要认为于己不利,便百般拖延。不免让人想起金法郎案,法国抓住此

案,竟将关税会议拖延几年。为此,中国特地声明,一旦新关税协议签字,三个月后,即付诸实施,而不管其国批准与否。自那时起,海关将按新税率征收进口税。其中一部分税收将用于补偿中国因放弃地方过境税的损失,这是中央政府为达成谅解对省政府必要的妥协。通过与地方政府就这一问题协商,取消地方过境税没有太大的困难。

在实际公布执行关税自主与废弃厘金以前的过渡期间,中国将对进口商品抽取关税附加税,税率 2.5% 至 15%,视其商品性质,分生活必需品与奢侈豪华品,而附征不同税率。依各国惯例,仍对烟酒之类商品,课以重税。出席会议的列强代表似乎原则上都准备同意我国关税自主和过渡期内新税率的议案,因为这些国家自己正在享受关税自主,相比之下,中国的要求合情合理。然而,争论的焦点在关税增加部分的用途上。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曾就海关增抽 2.5% 附加税的收入如何分配的提问,做出过明确答复,归为三条:1. 用于整顿国内外债务;2. 用于国家建设;3. 用于支付中央政府的财政经费。因抽取 2.5% 附加税而新增收入,粗算不过 3000 万元国币。

为方便不了解中国关税内情的读者,本人在此不妨多着些笔墨,叙述过去中国海关在列强把持下的惨状。中国过去不仅不如其他一般国家,就连其中最小最弱之国都比不上。列强只允许中国对进口商品,不论其种类、性质,一律抽取不能超出 5% 的进口关税,这一行之有年的 5% 的规定,竟然没有受到物价变化的影响,物价虽然不断上涨,但付给海关的税金总量仍一成不变。

在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提出关税自主问题,但两次要求均遭拒绝。时至今日,国内舆论和政府中的新式官员,

不仅对国际法的认识愈来愈全面,而且,为中国主权而奋斗的精神与决心更为高涨,逐渐识破帝国主义把持中国经济主权的险恶用心。出席关税会议的中国代表志坚如钢,决心在这次会议上,至少要为中国赢回比1922年华盛顿会议决议更多的本应属于自己的权利。华盛顿会议决议只是对不平等旧约内容的简单修正。由于法国借金法郎案勒索中国,导致关税会议延搁数年,终使中国因此每年损失3000万元的收入,令国人深感愤怒。在这次关税会议上,中国实现了收回关税自主权的最低愿望,虽然新约付诸实施的日期未定,但已赢得列强首肯,实际上等于成功。中国关税主权,蒙受外国财政与经济上霸占盘剥的屈辱,历经一个世纪之后,至少从这时开始挣脱了关税枷锁。

经过大约一个月的谈判,中国的提案实际上被采纳了,基于此,列强在会议上表示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同意废除以往不平等条约中种种涉及关税的限制。此外,中国海关自主的新税率自1929年1月1日起生效。中方亦承诺在同日废止厘金的征收。这一决议既极其重要又意义深远,为中国日后自行管理关税事项提供了法律基础,即使关税会议中途而辍,未获全功,亦是如此。

关税会议中的第二委员会专门商讨附加税征收及其使用问题^①。当时估算此税开征后,可收入1亿元国币左右,用途将按3:3:3:1比例分为四项开支:其一,补助省政裁厘后的损失;其二,整顿国内外公债;其三,国家建设;其四,政府的特别经费。原来各省厘金收入约为每年6000万元,现在3000万元的分配额不足以抵

^① 关税特别会议有二项议程:一、关税自主问题;二、筹备自主期间的关税暂行办法问题;三、其他事项。因此,下设三个专门委员会分题讨论。颜惠庆出任第二委员会,即过渡办法委员会的召集人。——译者

补其损失,不足部分由各省所征统一税项下补齐。统一税的性质与厘金不同。

在第二委员会,我曾代表中国政府,私下同与会代表会谈数次,讨论国内外公债统一管理的方案。整理公债可供使用的资金仅 3000 万元,而所有内外公债总计约在 10 亿元,两者相差悬殊。然而,整顿计划也有可能成功,如果债权人同意接受某些条件,譬如:公债期限延长至 20 到 25 年,年息定为 2.5 至 3 厘,10 年或 15 年后再分期偿还本息,即可实现整理目标。同时削减可疑公债的面值。至于那些不仅借贷协议极为有问题,而且附有高利贷利率的公债,政府甚至可以不予承认。考虑到中国财政上所受到的种种限制,且考虑到要公平对待自己的国民利益,因此,这已是政府能够尽到的最大努力。

中国向会议宣布了整理债务提纲,准备就此和外国债主争个水落石出,我国代表坚持内外债一律平等对待,指出必须承认其中某些外债是恶意欺诈。此时,外国代表分成了两派。一派希望将政治性借款(主要是日本借款)从中排除;另一派则强调债务用于建设的目的,类似性质的借款为中国的建设事业提供了物资与设备。也有人提出不问债务性质,一律公平对待。关于准备发行的新债券,自然难为各国认可,某些代表竟要求债券年息高达 7% 到 8% 之多。但是,他们经过多方寻根问底,得知中国在过渡税率上的最大让步限度难遂其愿时,于是,要想让他们屈服于外债整顿方案,便变得比登天还难,除非中方在税率上做出让步。但没有任何一方打算让步,谈判顿时陷于僵局,这一问题倘若不解决,关税会议将无法再继续进行。

中国太不幸了,致命的军阀战争此时又重新开场,开场戏便是

奉系郭松龄将军背叛其主人张作霖大帅。郭将军似乎久蓄异志，他认为自己受到的待遇不公平，因此倒向“基督将军”冯玉祥。冯此时也不再对其新盟友张大帅有什么好感，因此，郭、冯联合通电，敦请张大帅下野，代之以其子张学良接任军政大权。然而，郭兵变迅速失败，他本人被执行枪决。他的旧友新盟冯玉祥将军，在郭将军失败之后，遂感压力，不能再安其位，故暂时从军政事务中引退。说来也怪，他的引退，却促成奉系军阀和吴佩孚大帅的再度合作，尽管双方曾经兵戎相见过。

北京的新政府声望每况愈下，工人学生集会游行要求段执政下野。他对此无动于衷，仍改组政府，指定总理，更换阁员，将以前不为他所喜欢的，包括被视为孙中山先生同党的某些阁员，统统解任，借此巩固个人权位，壮大皖系实力。曾经是他的主要支持者的张作霖大帅，如今已宣布独立，公开表示对北京政府的不满。此时内阁又一次改组，竟然未征得我的同意，就明令指定我为外交总长，不过，后来总算做了改变。此事发生在1926年3月，当时段政府历经16个月之后，终于快走到了尽头。所有事件产生的不良迹象，使出席关税会议的外国代表深为疑虑，虽然小组会议仍暂时继续进行，但据一般的判断，大会实在难以取得成功。特别是列强不会同意我国整理内外债的方案，对于他们来说，这是谈判计划中最为紧要的题目。

我记忆犹新的是那一年4月，冯将军的部队撤出北京。从1924年10月23日军事政变后，冯军开始控制北京，时至今日，来自津浦、京奉线不同方向的军事压力，使冯军难以应付，故冯将军经深思熟虑，认为不宜继续留在北京。冯军撤离之前，恢复了前总统曹锟的自由，无非是向段执政示威，段只得前往外国使馆区寻求

避难。在奉军及其盟友吴佩孚的部队未进驻北京以前,组织维持委员会是必要的,由它来保障政权真空期的社会秩序。冯玉祥所率国民军撤离之夜,政界资深人士王士珍、赵尔巽、孙宝琦、熊希龄诸位先生与我相聚到市政府,监督撤退是否有秩序地进行,监督警察是否忠于职守,监督北京的新主人们能否保持北京局势之稳定。整夜我听到的都是数百辆骡车的声音,车上满载军事物资与冯军将上,经过市政府门前,开往新的营地——南口。

临时执政府最终成为了历史,段祺瑞执政历经平生最风光时日以后,于4月19日通电宣布下野,他离任前最后处理公务时,有一项就是任命我为驻伦敦的中国公使。但由于公私各方面原因,我未能出使上任,即使如此,对于他的关照,我甚为感激。

在国内秩序恢复期间,北京政府逐渐失去其控制的各省,原来的忠实支持者也反目成仇,自行其是。时局维艰,关税会议自然不能按计划继续举行。中国代表深感政局险象丛生,有必要把关税会议的进展情况告知国人,遂于1926年4月11日通电全国,叙述事情始末。电文意简言赅,但准确地表达了中国代表在关税会议上的原则立场,在此值得将电文转述于下:

此次召集关税会议,原以收回税权,救济财政,发展经济为目的,查民国十年,华盛顿会议,列邦仅允对于普通进口货物,加征值百抽二点五之附加税,对于奢侈品,加增较高之附加税,惟以值百抽五为限,核计此项收入,每年不过三千万元,其用途与条件,尚须与各国商定,而关于税权自主一层,未克详加讨论,预计各项用途,上项三千万元,万不敷我分配之用。且我国经济,苦于税权之束缚者,已久,仅增高税率,尚非根本之图。故会议之前,我国方面,即决定根据华会前议,提出关

税自主,惟在自主之前,对外对内,不能无所筹备,故又决定以增加附加税为过渡之计,提高华会所定之附加税率,使收入能达一万万元以上,而其支配则斟酌华会时讨论情形与国内需要,拟以三成为裁厘准备金,三成为整理债务基金,三成为建设费用,其余一成,供紧要政费,此原定之方针也。开会之初,我代表即将自主案与附加税案,同时提出,各国代表鉴于我国主张之正大,已将自主一案承认,定于民国十八年一月一日实行,同时我国亦宣言将厘金裁撤,其附加税率及其用途支配办法,各国意见不同,迭经磋商,始有端绪。兹分为税率、裁厘、偿债等数大端,约略言之:附加税率,我国原拟普通货物,值百抽五,甲种奢侈品,值百抽三十,乙种奢侈品,值百抽二十。即普通品增加税率,较之华会原议增加一倍。奢侈品附加税率,增为四倍至六倍。各国以此项税率过高,未肯赞同,经多次讨论,改定税率,重分货类,始有允将附加税增至七千余万元至九千万元之议,仍待正式决定。此项税率,既超过华会税率范围,须俟各国批准,方能实行,至早亦待明春以后,在未批准实行之前,如仍用值百抽五旧率,我国吃亏益甚,拟先暂行华会附加税率,俾税款可早日增加,此议增税率之情形也。裁厘之议,我国商民,企望已久,只以事业错迕,迟延至今。兹由我国宣言于民国十八年一月一日以前裁尽,其抵补之款,先在过渡期间,附加税中筹措。各国代表,因商务关系,亦各具意见,迭经讨论,未有归宿。惟定期裁撤,本系我国自动宣言,将来应由中央与各省区通力合作,总期抵补确定,庶使裁撤可以实行。如何规定程序,预为筹备,尤当通盘加以审度,此讨论裁厘之情形也。我国财政交通两部积欠,无确实担保内外债务,

至八九万万元以上,其中外债,居十分之六七,各国对此,最为重视。此次关税会议开会之后,迭与关系各国代表个人接洽,关于债额条件,期限利率,彼此利害相反,主张歧异,舌敝唇焦,尚未确定办法。现拟先定大纲,再由财政整理会,详商节目,此磋商整理债务之情形也。其他关款之存放,陆路边界税收之划一,各项问题,亦皆在磋商之中。要之,我国方面,非有充裕之收入,不足敷各项用途之支配,故以增加税率,为先决问题。在各国方面,则因商务及债权关系,必须将裁厘及偿债定有办法,乃肯决定税率。开会以来,接洽几无虚日,而争议纷纭,综其结果,只得概括之范围,尚少具体之决定。惟自主一层,既编定案。税权不受条约束缚,将来善为张弛,国民经济,自有发展之希望,关税收入,亦宽留增加之余地。至于过渡期内,用途繁多,而附加税收入,既然决定加至九千万元,将来实收之数,能否足额,未敢预定。就此数分配裁厘抵补,偿还债务,每年至少约各需三四千万元。所余建设费及政费实属无几,但不得不拮据支持,以待自主届期,另行支配,此又交涉困难之情形也。以上各端为本会开会以来经过情形之概要。综观关会形势,各国代表,有鉴于国内频年不靖,军需浩繁,对于条件用途,郑重迟回,久而不决。比者近畿发生战事,会议因之无形停顿,各国代表中,且间有回国者,瞻念前途,殊深焦虑。夫以我国今日财政经济情形,关税能否增加,所系既属甚巨,而税权之收回,国际地位之增进,影响尤极重大。倘因应付失机,即时乎不再,通力合作,端赖内外之同心,贯彻始终,实亦友邦之殷望。用将开会经过情形,撮要电陈,诸希鉴察!

通电用意极为明显,一方面,向国人简明通报了关税会议的情况,另一方面,吁请军阀尽快结束不义之战,致力于改造中国经济、财政的痼疾。关税自主权能否行使,既依赖于列强态度,更需我们自己努力。但如此呼吁,军阀们仍无动于衷。

段执政下台后,国家陷于无政府状态中,无论宪政的、独裁的、临时的或其他什么形式的政府,一时皆未能成立,究竟新建政府采用何种形式,似乎还没有一定之规。直系如今拥戴的首领吴佩孚大帅提议,采用旧例。他曾与奉军交恶,战败下台,时隔仅一年半后,两系又捐弃前嫌,结为同盟。他主张恢复大总统曹锟在位时的内阁,由我仍任国务总理,代行摄政。我本无意再入政治旋涡,因为两系的合作不过是休战之间的暂时联合,一遇机会,两系中的任何一方,都可能为了独霸地位而大动干戈。

此外,张作霖大帅对我仍可能耿耿于怀,不忘旧怨,这是因为1924年直奉战争时,是我以总理副署大总统令,对其惩办褫夺本兼各职的。他接受了昔日的敌人,引为现今交臂结欢的同道,目的是为了打击冯玉祥的国民军。然而,不能肯定他一定会忘记一位文人总理敢于冒犯他的行为。然因其目前的权力既不能一手遮天,声威又远逊于下台的段大帅,径直宣布自己为中国的执政者,恐非易事,故能容纳他人的建议。

考虑到张大帅自己也正左右傍徨,而成立某种形式的政府又迫在眉睫,于是,我在民国元老王士珍和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等折衷方案发起者们的敦促下,于5月13日,勉强复任内阁总理。曹锟大总统已于本月1日再次宣布辞职。内阁成员大体一如其旧,呈直奉两系联合的特征,还包括两系均认可的人物,即中立的施肇基、顾维钧与王宠惠三博士。一个月后,政府工作已然启动,

我便毅然辞职,由海军上将杜锡珪继任总理,其人并非政客,可能会免遭非议与攻击。

虽然政府在表面上已经成立,但没给列强留下深刻印象。我卸任之后不久,他们发表宣言称,直到中国代表团能以正式政府代表地位,自主地出席会议以前,他们认为关税会议应无限期暂停。然而,摄政内阁早已追加一批直奉两系人物作为会议代表,两系认为应该由他们来分享增加关税收入的美名。

实际上,关税会议已经名存实亡,只不过不为外人所知罢了,远在广州的国民政府甚至还通电反对重开此会,批评北京政府在关税会议上为求得 2.5% 的附加关税以渡过财政难关,而牺牲了关税自主权利,呼吁国人群起攻之。当然,所贬之辞并非事实,但至少为列强提供了另外的借口,拒绝继续参加会议。

北京政局愈加瞬息万变,9月,杜上将自知难为,辞去总理。此时,国民革命军北伐已至汉口,吴大帅撤至郑州。冯玉祥将军自苏联归来,正式就任西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顾维钧博士此时已成为代理总理。蔡廷干海军上将也出任了数日的外交总长。

11月,张作霖大帅迫于压力,不得不挑起军事重担,北方将帅不仅在南方连遭重创,弃城失地,即使是大帅本部在北方也受到冯军严重威胁。他不再对北京政府感兴趣,当月在天津与各方首领会议,决定暂时抛开内阁组建问题,全力筹划军事大局。而各方首领认为必须推举一人领导全局,故于11月30日,张就任安国军总司令。

1927年2月,顾博士任国务总理期间,发生了一起具有国际影响的事件。时任财政总长的汤尔和博士,原为大学教授,新近进入北京政府。正逢关税会议已奄奄一息数月,中国政府不愿其

寿终正寝，内阁便于1月召集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共商挽救之策。

共商结果，决定根据华盛顿会议规定方案，立即开征2.5%和5%的附加税，开征细则留待内阁拟出。不久以后，内阁拟出细则，发布开征上述两税项的命令，并指示外交总长通知列强，同时敦促关税会议尽快复会以便会商其他事项。

总税务司安格联爵士(Sir Francis Aglen)接到开征附加税之令，却拒不执行，他躲到上海，后又转赴汉口，投入未来将统治中国的国民政府的怀抱，邀宠请功。因此，北京政府于2月1日下令解除其职，改派易纨士先生(Edwardes)继任总税务司。内阁此举立刻引起各方面轰动，然而从法治与政纪立场上看，此举非常恰当有理。但是，为保全安氏脸面，官方正式致函于他，感谢他以往的服务业绩，并送齐一年的总税务司职位薪金。

如此处理总税务司安氏的失职行为，外交总长顾博士还是招致了英国政府的严重不满，认为中方解聘安氏是带有挑衅性质的不友好行动。面对著名的总税务司安氏收到解职命令的这一事实，英国政府岂能不公开抗议？而中国政府墨守先前惯例，仍以英人填补空缺，总算能消解英方的心中怨气。

在我担当公职期间，曾有机会与安格联接触多次，虽然与之交往毫无困难，大家也都公认此人尚属尽职，公正廉明，但绝非机警老练、政治敏锐之辈。其照看整理内外公债基金时，声望职权益隆，竟夸大其辞，自居其功。他漠视中国近年来发生的巨变，对待中国政府及其官员仍颐指气使，有如历史记载中的赫德那般霸道，却不如赫德狡黠与善于见风使舵。

1911年中英就鸦片协议谈判时，就重征鸦片关税问题，征询

安氏和裴式楷^①(Sir Robert Bredon)两人意见,后者赞同我国提出的从价税率,而前者竟然完全附和英方主张。在关税会议期间,他又故伎重演,反对中国执行累进征税制,人人皆知,此法比5%的固定税率更为科学合理,然而他却说累进征收关税,要比先前加大计算总量,挤占海关职员太多的时间与精力。他就是用这样的天真与傲慢来为中国政府服务的。安氏获总税务司之职,纯系偶然。根据前清放缺成例,当重要职位空出,军机处进单,单上列名三人,由皇帝圈定一人。总税务司简放,也不例外,因安氏英文姓氏第一字母为A,他的名字列在了名单的第一位,尽管推荐部门早已中意他人。^②进单送到皇上那里,由于拟单大臣的倾向过于隐蔽,以至不能暗示出自己偏爱的人选,所以,皇上的笔照例圈定了第一名,安氏因此获得肥缺,成为总税务司。

遗憾的是,中国以往所雇用的洋人很少能恪尽职守,忠心服务。即以服务海关的洋人而论,其待遇薪金远在国人之上,即使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亦显优厚。我国年轻人初入海关服务,月薪不过白银16两;而外国初来者竟得10倍之多,至少在160两以上。

20世纪初叶,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留学生到海关求职,也被告知与其他中国人同等待遇,而不论其所受教育程度如何。赫德的政策就是要使海关永远被外国人把持,而不让它建成纯粹的中国机关。其所作所为,如果还有什么忠诚可言的话,那真得感谢雇主的仁慈了。邮政从海关分出后,法国人控制了其机关,也仿效海关

① 裴式楷:英国人,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内弟,曾担任中国海关代理总税务司。——译者

② 军机处进单,列名不曾听说有按姓氏笔画排列的制度。可能因海关总税务司一直使用英人,单中所列皆是外国人中文名,故依其英文姓氏字母排序,或是任命另有办法,待考。——译者

故伎，置中国雇员于助理地位。唐绍仪先生早年由美国归来后不久，即在朝鲜海关任职，深知其中弊端，开始推动建立稽查机关以分海关之权。其后，他升任高级官员，^①促成税务处的建立，以此主管海关行政，总税务司也在管辖之中。这样，就粉碎了总税务司进一步建立“独立王国”的梦想。

某日，赫德曾当面向唐先生夸耀海关工作的高效率。唐先生回告：“是的。但是中国政府付给的管理经费是岁入的13%，而其他国家的管理成本均在10%以下。”后来，海关出资在北京开办税务学校，毕业生入海关服务，各项待遇接近同级外国雇员。而国内外名牌大学毕业生，虽具真才实学，但连一般职员都没资格做。难怪孙中山先生指出，列强以半殖民地对待中国。

在我国聘用过的外国顾问中，有一位著名的新闻记者的聘金非常丰厚^②，这是因为政府相信他能运用个人的巨大影响力，向海外报导宣传中国。但不幸的是，他一旦成为中国政府的雇员，他的公正平民性质的影响力就不复存在了。而另外两名科学家的工作^③，才是真正产生了巨大影响。两人在所服务的机构内卓越有效的努力，使年轻人思路开阔，心系科学知识。还有一名顾问是前欧洲外交官^④。他在受聘期间处理各类外交问题极为老道，此人聪睿有才，后来竟成为中国财政专家。受聘于司法部的一位

① 光绪三十一年循十月廿一日(1905年11月17日)，署外务部右侍郎，三十二年正月，实授。——译者

② 这里似乎是指英人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 1862—1920)，他曾是《泰晤士报》记者，后任袁世凯政治顾问。——译者

③ 当指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Arnold William Grabau, 1870—1946)和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n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两人。——译者

④ 当指俄人葛诺发(N. A. Kononoff, 1877—?)。——译者

顾问¹⁾，也备受尊敬，曾帮助我国草拟各种法规，并将其译成外文。军阀也常聘用外国军事顾问，这些名曰军事顾问的人物不过是充作军阀护卫与政治联络的工具而已，至于军事专业知识则未知如何。袁大总统在利用外国顾问方面表现出了难得的精明，他从这些人身上获益非浅，从而有利于他众所周知的个人计划。

当然，出现这种用非其人的结果，有人归咎于不知如何选拔人才，所以，不能雇用到真才实现预期目的。事实上，我早年在京从政时就已发现，中国政府无论何时决定延聘顾问，必引起一番激烈斗争，各使馆竞相举荐本国人以免遭到冷遇，为此竟提出“门户开放”与“利益均沾”的原则。总体而言，政府所聘顾问，其优秀者多系专家学者，而平庸者大都是教会出身之辈与新闻记者。过去官方聘用外国人作为顾问，只知道凭关系亲疏，而不问是否胜任其职，凡与中国官员或其内眷接近的外国人，才可望入选。这也是中国官场的风气。

国民革命军在南方获得了巨大成功，并控制了长江沿线，实际上已逼近北京。而北方军阀仍欲作最后的顽抗。1927年6月，安国军主要将领，还有一批直系将校，在北京召开会议，公推张作霖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随后通电全国，重申反对“赤化”之决心，他们认为，国民革命军已受“赤化”影响。此举实际上是在步段祺瑞执政府之后尘。张把顾博士内阁及其同仁弃置一边，全无愧色。另择曾任财政次长及交通总长的潘复出任内阁总理，阁员几乎都来自奉天，面孔生疏，没有什么中央从政的经验。

1) 当指法国人宝道(Georges Padoux, 1867-?) 1919年任司法部顾问，曾一度兼华洋义赈会副会长。——译者

据闻,有人曾力劝张大帅,新内阁应聘请资深名望之士参加,以壮内阁声色。不过,他执意保留内阁成员的“清一色”。他认为政府内部如容纳不同利益与怀有二心的人加入,常常会因意见冲突,使内阁不能开展工作,反不如清一色内阁更便于掌握。他说:“无论如何,在这样的体制下,倘仍不能成功,吾至少可满意尽了人力。吾领导之下,执行如此政策方略,即使失败,亦无怨尤。”但是,他并没有紧闭政府大门,拒非奉系人物于门外,很快组建了各种委员会,协助各部工作。例如:孙宝琦先生被聘为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我也滥充其中。大帅之旧友,像梁士诒先生及其交通系旧人亦重受恩惠,但仅派为一般闲职,因为奉系决不允许他们在新政府中势力过大。

不久以后,奉军遭受更为严重的军事威胁。国民革命军已成功地赢得山西督军阎锡山将军的合作,阎、冯两将军联合,使奉军难以应付,被迫采取攻势。然而,奉军早已注定了失败的命运,此时,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长驱北上,已占领津浦线重镇德州和京汉线重镇保定,逼近北京。

1928年6月2日,张作霖大帅在就任陆海军大元帅整一年之后,迫于形势通电下野。众所周知,其后自京返回奉天,专车即将抵达奉天时,为炸弹所毙。据亲历救助的医官所言,当时伤非致命,立即搭上汽车由车站驰往家中,终因流血过多死于途中。一个人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真是悲惨之至。至于他对国家民族的功罪,尚难公断。他是一位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全凭个人奋斗白手起家的人。他以自己的历史证明了他的非凡能力与精明,在东三省发号施令多年,不愿为日本的阴谋诡计所利用,并反对日本逐渐扩大占领区。他有一般军阀所具有的令人生厌的弱点,如果他作为

未加冕的东北王,能保持地方稳定,而不是挥师进京,欲图霸中原,其身后将可能留下另一部个人历史。他与另外几位军阀大帅的情形如出一辙,皆好大喜功而命运不济,虽然期望改变中国现状,却徒增生灵涂炭。如果他们能保持自身的道德尊严,一定能创造辉煌成就,但是,他们在爬上权力与荣誉的巅峰之后,都迅速而狼狈地跌落下来。

张作霖身边不乏智能之士,遗憾的是他不能久用其才,从善纳言,一味地我行我素,使这一人才荟萃的优势,在极其困难的现实条件下无从发挥。

北京或曰大总统宝座,犹如明火吸蛾一样,吸引着各路军阀大帅的行动,结果烈火伤其羽翼,甚至断其生命。军阀们不择手段,必欲以捷足先登为快,最终导致国家混乱,民不聊生。如果他们一直愿意为现状的改善而尽力,也就是说,促进现状发展来证明国家不能缺少他们的服务,那么,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则非常大。但是,大皇帝的桂冠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他们视个人的声威远比为国家服务更为重要。为此,不惜以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作为祭品,来装点他们身后的荣耀。